

西方思想家譯叢②

柏拉圖

作者：R. M. Hare

譯者：李日章



西方思想家譯叢②

柏拉圖

Plato

R. M. Hare 著 李日章 譯

柏拉圖

黑 爾 (Hare, R. M.) 撰 李日章譯 民國72年
臺北市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印行

民國73年第二次印行

[3] 111面 21公分

原書名：Plato

附：推薦書目、人名註釋及索引

I. 黑 爾撰 II. 李日章譯 III. 西方思想家譯叢

141.4

843

73

NT \$ 100.00

序

研究柏拉圖的學術著作已經卷帙浩繁而且還在不斷增加，本書無意再添上一冊，只想對有心認識柏拉圖的一般讀者提供一項幫助與鼓勵。因此，我始終都把介紹的重點集中在柏氏比較簡單的幾篇對話錄上，也就是集中在其早期與中期的對話錄上，雖然晚期的幾篇並沒有完全加以忽略。對柏拉圖的闡釋並不容易，幾乎每句話都可能招致其他學者的辯駁。我只能竭盡所能的，以一種容易理解的方式，把我所認為的柏氏的本意陳述出來；由於這是一冊通俗讀物，我除了徵引若干原文之外，實在不容更進一步為自己的見解多所辯護。我自認這些見解絕不是什麼異端邪說，不過有待商榷之處，我也盡量不加隱瞞。我致力的第一點，就是指出柏氏對話錄跟當今困擾我們的某些問題（包括若干很實際的教育與政治問題）有何關聯。為了說明這一點，我偶而不免提到若干近代思想家的名字；不過即使讀者對這些人一無所知，也不會妨礙他對本書的了解。

為了集中於我所以為的柏氏哲學的核心，許多有趣而重要的話題，不得不有所割捨，這是令人遺憾的。要是情況許可，我一定也會談談柏氏有關愛情與藝術的見解。柏氏對話錄的文學性與戲劇性，是毋庸我在這裏多加吹噓的；它們至今仍然像當初問世時那樣的清新悅人。

本書初稿，承蒙多位同仁的批評與指教，使我獲益良多。雖然他們對柏氏的認識絕非淺學如我者所能比擬，但是我仍不免時或頑冥不化，固執己見。對此，他們竟然包涵寬諒，不以爲忤，這是我特別銘感於心的。此外，我如果不是有幸在「史丹福行爲科學高級研究中心」度過一九八〇這一年，我也不可能從事本書的寫作，更不用說完成它了！這一年，我過得愉快自在，無憂無慮。因此本書與另一冊篇幅更長的書得以順利的在打字機下完成。爲此，我要特別向該中心的主任與工作人員深致謝意，也要感謝牛津大學恩准我前往該中心研究。

書中徵引的原文，都在後面的括弧內註明史蒂法納斯（Stephanus）* 版本頁數。

黑爾（R. M. Hare）

* 譯註：史蒂法納斯為法國印刷商與書商世家，以出版希臘與拉丁古典原著而知名。此處所指為 Henricus Stephanus (1528-1598)，他在一五七八年所編訂的柏拉圖版本頁數，是一般學者引述時共用的公器。

目錄

序.....	I
第一章 生平與時代.....	1
第二章 柏拉圖的前驅.....	11
第三章 柏拉圖如何變成哲學家.....	21
第四章 了解柏拉圖.....	33
第五章 認知東西.....	41
第六章 定義、辯證法與善.....	53
第七章 教育與好的生活.....	65
第八章 分割的心靈.....	71
第九章 集權國家.....	79
第十章 柏拉圖的成就.....	93
推薦書目.....	103
人名註釋及索引.....	105

第一章 生平與時代

本書雖然不是傳記，還是有必要介紹一點柏拉圖生長的环境；因為如果對此一無所知，我們將無法了解他如何成爲一位哲學家，以及如何成爲像他那樣的哲學家。現存有關他的傳記資料，很多都不可靠，涉及其哲學發展的也很少。有些信件相傳是他所寫的，其中有的很富自傳的意味。這些信件的真實性固然有待商榷；但即使是假造的，它們的時代也必定跟柏拉圖在世的時候相當接近，因此頗有參考的價值。後來的作家所寫的柏氏軼事，大半不是失之不經，就是失之瑣碎，甚至兩者兼而有之。因此，它們所談到的許多細節，我們便大可不必費神去推敲，譬如他究竟是不是因爲肩膀寬闊或額頭寬廣才被他的父親亞里斯托克利斯（Aristocles）命名爲「柏拉圖」。但是我們確知他生涯中至少有三件事情是對他影響深遠且關係重大的。

柏拉圖在西元前四二七年誕生於雅典一個上層階級的家庭，享年八十歲。雅典帝國覆沒的時候，他應該已經到了懂事的年齡，因此對這幕悲劇，他必然耳聞目睹，印象深刻。他又克享高壽，得以親見型態迥異的另一個帝國興起，那就是馬其頓王菲立普（Philip of Macedon）的帝國，這個人的子嗣亞歷山大（Alexander）後來征服了大半個世界。在這前後兩個帝國之間的空檔時期，則是發生在希臘小城邦之間

的連綿不斷的戰爭，其間雖有若干城邦得以相繼登上盟主寶座，但是沒有一個城邦能够統一希臘。這番偉業有待亞歷山大來完成，但那已是柏氏去世以後的事了！

雅典帝國是在西元前第五世紀初葉，希臘人獲得輝煌的勝利，解除了被波斯征服的危機之後建立起來的，它的精神基礎是一項聯盟，其目的在保障希臘諸城邦的自由。希臘偉大的史家修西底特斯（Thucydides），曾經錄下了這帝國的肇建者柏里克立斯（Pericles）在紀念雅典對斯巴達戰爭的國殤時所發表的一篇演說^①。這篇演說非常有名，因為它清楚表達了激盪柏拉圖父執輩雅典人心靈的某些理想。凡是想了解柏拉圖的人，都有必要一讀修西底特斯所寫的這段希臘史。這篇演講，柏拉圖曾經在他的對話錄〔門尼克西納斯〕

（*Menexenus*）篇中嘲弄地加以模仿。這篇演講所表現的那些理想固然很高遠，但是以我們的眼光看來，卻不是完全合乎道德的。露骨的帝國主義思想在其間扮演了一個重大的角色，柏里克立斯關心雅典正在形成中的美好國家形象，更甚於關心對盟邦的公道，典雅逐步的正在把這些盟邦變成她的臣屬。她以一種前所未有的貪婪的專橫方式統治她們，用她們的貢金在阿克羅波立斯（Acropolis）山上蓋了一座至今還讓我們驚異不置的神廟，並且用以維持一支其霸權所繫的海軍。爲了儆戒繼起的效尤者，她對不順從的城邦採取越來越嚴厲的懲罰手段：邁提林（Mytilene）差點遭到屠城的厄運，好在在最後關頭暫緩執行；米洛斯（Melos）則真的完全被絕滅。

心中存着這些希臘歷史的印象，再來披讀〔哥吉亞斯〕（*Gorgias*）篇等對話錄，我們就可以看出柏拉圖是有感而發的。他對當時流行於希臘的某種心態，不管是見諸個人或見

^① 見 Thucydides II 35.

諸整個國家，都懷有一種出於道德意識的嫌惡。這種心態就是重視榮譽，更甚於重視使人得以「凝成一體」的美德。談到帝國的肇建者時，他說道：「他們拿來充實這城市的，不是中庸與正直，而是港口、船塢、城牆、貢金，以及諸如此類的無聊之物。」（519a）

直到西元前四〇五年雅典帝國戰敗為止，整個西元前第五世紀的最後三十年，雅典帝國幾乎一直處於與斯巴達的戰爭狀態中，斯巴達也組成聯盟力抗雅典，最後終於擊潰雅典的霸權。在戰事的後期，柏拉圖已經長大成人，因此也跟其他公民一樣，應召參戰。可惜我們沒有關於他的可靠服役紀錄。他那個階級的壯丁照例都要加入騎兵；而據〔共和國〕（*Republic*）一書所說，他的兄弟們都打得很出色（368a）。

上面提到柏拉圖的社會地位，這也許會提醒我們：在柏氏在世的那個世紀以及其後的一個世紀，希臘城邦還存在着另外的一種鬥爭，這種鬥爭不是發生在城邦與城邦之間，而是發生在城邦的內部。當時幾乎在每個城邦中，政治上都分裂而為上下兩個部份：一個是上層階級，一個是其他的自由民（為數眾多的奴隸暫且不談）。這倒不是說當時就沒有出身貴族而主張民主的人；事實上，像柏里克立斯這種貴族的維新黨員（Whigs）在民主政體的發展過程中確實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而當這種政體盛極一時的時候，帝國的理想確曾一度獲得全民一致的擁戴。但是逐漸的，這些貴族出身的領袖們，一步一步對白手起家的人以及這些人的子孫讓出了他們的地位。因為這些布衣之士能够在羣眾的集會（那就是他們的國會）中投合大眾的喜好。柏拉圖的階級對這些煽動家心存輕蔑，其中又混雜着一絲恐懼。這種複雜的政治情懷可以見諸當日一份政治小冊子的開端；這份小冊名為〔雅典人的政體〕（*Polity of the Athenians*），它說：「雅典人所

選定的這種政體，我不敢恭維；因為選擇了這種政體，不管選擇了一條道路，循此道路，壞人比好人更容易出頭。」②柏拉圖就是成長於這樣的一種政治情懷之間。

雅典的敵人，斯巴達，則由於自身的利益與偏好，大力支持貴族政治或寡頭政治；雅典平民黨的領袖們一向都是主張對斯巴達作戰最力的人，有錢人則比較不熱衷於此，猶如他們也比較不熱衷於帝國主義，因為打仗總會威脅到他們既有的財產與生活方式。在十九世紀促使英國上層階級與其他歐洲人傾向帝國主義的那股勃勃野心，確也存在於柏拉圖當時的希臘，只不過它的展望不如十九世紀那麼吸引人罷了；因此，正與我們的想法相反，在雅典，帝國的主要受益者與支持者並不是有錢人，而是窮人。當時大部份希臘城邦中的民主主義者都贊成與雅典結盟或臣屬於她，邦中的「少數」則尋求斯巴達的支持。

隨着戰爭的持續，上述內部的分裂也愈趨嚴重；甚至在雅典戰敗之後，事情也沒有了結。這種分裂在整個西元前第四世紀中繼續進行着。個人無羈的野心，乃是驅策政客們的主要動機。在〔米諾〕(Meno) 篇中，當蘇格拉底要求一名青年為「美德」(virtue, excellence) 下界說時，這位青年答說：一個人的美德就是當其從事政治時，能够為益於朋友，為害於敵人，同時又能小心不使自己受害(71e)。這名年輕人堪稱當時的一個典型。在〔哥吉亞斯〕(Gorgias) 篇中，另一名青年表示十分妬羨馬其頓的阿契勞斯(Archelaus of Macedon)——這個人謀害了多名至親，終於使自己奪得了王位(471b)。

比較而言，政治謀殺與屠殺這類希臘常見的罪行，在雅

② 有人誤以為〔雅典人的政體〕是齊諾芬(Xenophon)所著而收入他的作品集中。

典本身還是較少發生；但是如果我們能够在現代報紙上讀到西元前四、五世紀發生於希臘的事件，我們還是會慶幸自己沒有生活在那裏。如果我們從未聽說過當時的文化成就（如巴特農神殿就是建於這個時代，如世界最偉大的詩人與劇作家年復一年的把他們的戲劇在當地節慶時推出上演），這種感覺就要更加強烈了。我們也許還會注意到當時有兩位相當殘忍的政治領袖，克利提亞斯（Critias）與戴奧尼修斯一世（Dionysius I of Syracuse），居然還經常撰寫悲劇，在雅典的賽會中演出——這兩個人物不久還會在本書中談到。

希臘城邦之間的鬥爭與城邦內部的鬥爭，這兩種惡行，究竟如何糾正？關於前者，柏拉圖所言甚少（關於這點，他的文學上的勁敵艾索格拉底 Isocrates 曾經留下較多的紀錄）。關於後者，他則在〔法律〕（*Laws*）篇及其他地方把它當作一個必須解決的主要政治問題來處理（628a, b）。他認為內部鬥爭可以藉良好的政治制度加以消除，而找出這麼一個制度則是他努力以赴的主要目標。

使希臘城邦道德動搖的，還有一個更普遍的原因。那就是她們在心智上日趨複雜，這也許是濶大了文化的眼界的結果。希羅多德（Herodotus）的波斯戰爭史中記載了如下一則故事^③：一位波斯統治者讓幾名希臘人與幾名印度人會面。依希臘習俗，親人死了以後，必須加以焚化；依印度習俗，親人死了以後，必須加以啖食。兩者在獲知對方習俗之後，都為之驚異不置。波斯王由是得出一項結論：

習俗，這萬物之王，

諸神與衆生，

都受其引導。

它使最大的暴行也成為理直氣壯；

③ Herodotus III 38.

它的手牽制一切。

以上是品達 (Pindar) 所寫的一首詩。柏拉圖在〔哥吉亞斯〕篇中也曾加以徵引 (484b)。

詩中譯為「習俗」(custom) 的一個詞，也有「法律」(law) 之意。我們從上面的故事可以看出當時有一種觀念是如何的盛行，這種觀念認為法律與道德都只是基於習俗，它們甚至沒有一個穩固的宗教信念在背後支持。柏拉圖在〔尤賽弗羅〕(*Euthyphro*) 篇中指出：甚至諸神也由於各自的傳統而彼此爭執；天上也跟地上一樣，道德的歧異引發內戰 (7e)。

這種相對主義的思想，在普羅泰哥拉斯 (Protagoras) 的學說中表現得很清楚，普氏與蘇格拉底同為前輩大思想家。他說：「人為萬物之權衡，存在者則見其為存在，無有者則見其為無有。」照柏拉圖在〔席厄提塔斯〕(*Theaetetus*) 篇所說（他在本篇中討論了這個學說），普氏的意思是「每個人都是他自己的真理的標準」(152a)。稍後我們還會談到柏拉圖與蘇格拉底對這種相對觀的反駁；不過，即此已經可以看出古老的道德藩籬已是如何的破敝，特別是在政治方面。

肆無忌憚的政治鬭爭與道德相對主義，兩者互相助長了對方。修西底特斯在一段極為精闢的文字中指出：這情況甚至影響到思惟所藉以進行的語言。在他論及政治暴行的影響時，他說：「為了替自己的行為辯護，他們顛倒了文字之慣常的描述意義。」他舉例說：本來應該被稱為「不負責任的賭博」的，卻被稱為「一樁勇敢而表現同志愛的冒險」④。這個作法在〔共和國〕一書中也曾經提到，它正好跟近時所謂的「說服性定義」(persuasive definition) 如出一轍。它的

④ Thucydides III 82. 至於「說服性定義」，見 C. L. Stevenson, *Ethics and Language* (1944), Ch. 9.

直接結果便是推翻了道德；間接的則是促使蘇格拉底與柏拉圖著手尋求一套方法，以便發現道德詞語的「可靠」定義。職是之故，我們才會經常看到他們在問：「勇敢是什麼？」「正直是什麼？」「善是什麼？」

我們可以想像得到，在蘇格拉底的影響之下，年輕的柏拉圖對解答前述的問題，懷抱着多麼熱切的希望；但是在另外一個方面，他也是成長於一個幻滅的氛圍中，這個幻滅由於大難的降臨而達到極致。他所受的上層階級的教養更加强了这一影響。正如前面所說的，雅典的貴族並不衷心支持帝國；他們大部份都心儀斯巴達劃一穩定的政治制度，柏拉圖的政治觀念有一部份即以此為藍本；而且有跡象顯示：雅典海軍最後在伊格斯波塔邁（Aegospotami）的覆沒，很可能與雅典貴族的背叛有關。

不管怎麼說，當斯巴達前來處置戰敗的雅典時，她雖然沒有像某些人所預期的那樣屠戮民主主義者，但為了保障自己的利益，她還是任命了一個寡頭的政府，這個政府被它的敵人稱為「三十暴君」（The Thirty Tyrants），其中有兩名就是柏拉圖的親戚：他母親的堂兄克利提亞斯（Critias）和他的母舅卡邁狄斯（Charmides）。他在他的對話錄中，對他們都相當友善。而實際上這三十個人是暴虐而專擅：柏拉圖在〔辯解〕（*Apology*）篇中就記載了蘇格拉底勇敢拒絕拘捕一名公民（民主黨徒李昂 Leon）的故事，這個人正是他們（三十暴君）企圖藉法律而加以謀害的。這個政府並沒有維持多久，最後終於被一個民主政權所取代，後者果然溫和得多。這時雅典已經失去昔日的榮光；不過她也沒有一蹶不振，只是從此淪為次等小國，在希臘政海中隨波浮沉。

一個不再能够振奮人心的帝國主義的民主政體崩潰了，繼起的對立政團（三十暴君）卻又倒行逆施，貽害社會。這

些事件對年輕的柏拉圖可能發生若何影響，我們不難想像得出來。本來出身他那階級的人，只要有能力，一定都會想在政壇上一展抱負，這是再自然不過的事。已有的證據顯示：柏拉圖確也曾經有志於此。可是既然想在這方面得到成功就得肆無忌憚，無所不為，柏氏之終於知難而退也就絲毫不足為奇了。據說在他年輕的時候，他還試過寫詩；從他留下的作品看來（其中包括少數幾首詩），他應該是有希望成為一個好詩人的；但是他後來發現還有一個更持久的方法，足以影響人們的心靈——他希望透過這個影響，更進而影響世間實務，所以他終於選擇了另一個行業。柏拉圖在〔共和國〕中曾經藉蘇格拉底之口道出了自己對政治的態度：「那就像一個人廁身一羣野獸之間，既不願參與他們的罪行，又無力抗拒周圍的暴行；在他還來不及為益於他的家邦或朋友以前，早已陷身於泥淖之中，對己對人都一無好處。」(496d)

西元前三九九年，雅典恢復了民主政體之後，柏拉圖崇拜的偶像蘇格拉底，卻被指控不信神祇與敗壞青年，公審的結果，被判處死刑。這件事情對柏氏影響深遠，他的幾篇對話錄，都涉及此事：〔辯解〕是蘇氏在公審中的辯白；〔克利陀〕(Crito) 記述蘇氏經判刑後所陳不願脫逃的理由——他若有意，那是輕而易舉之事；〔斐都〕(Phaedo) 記述蘇氏臨刑前論證靈魂不朽的情景，此外還有若干零星的指涉。柏拉圖似乎早就決心獻身於闡揚師說。

柏氏一生只有一次積極介入政治，但是其不愉快的結果，只有更加強了他對政治的厭惡。這件事情倒不是發生在他自己的家邦雅典，而是發生在西西里的賽拉鳩斯(Syracuse)。柏拉圖初訪西西里的動機不詳，很可能是在造訪附近的義大利城市之後順道一遊，當時這些義大利城市有許多傑出的哲人寄居，特別是畢達哥拉斯的門徒。柏氏之造訪諸

處，純粹是爲了切磋學問，當時他年約四十。當他在賽拉鳩斯時，他深爲青年戴昂（Dion）的風采所迷。這位青年的姊姊爲該邦邦君戴奧尼修斯一世（Dionysius I）之妻，這位青年則娶了自己的外甥女，即其姊妹之女。後來柏氏曾寫過一首詩歌詠戴昂，稱自己與他的關係爲「愛情」（love），並說這感情使他神魂顛倒。照當時希臘的觀念，這倒不是什麼不尋常的事。至於他所說的第二點，如果證以戴昂後來勸他所做的事，當知並無誇張。因爲這種事應不是柏氏神智清醒時所可能做的。

在西西里，戴昂拜柏氏爲師，接受他的學說。他這次造訪該島，究竟停留多久，我們並不清楚。有一個傳說說他最後竟被邦君戴奧尼修斯販賣爲奴，經友人贖身，方得恢復自由。不過量情度理，這似乎不太可能。但是無論如何，他畢竟又回到了雅典。回家之後，他隨即在雅典建立了一所哲學學校，由於學校位於獻給英雄阿卡德穆斯（Academus）的林園裏，故名「阿卡德米」（Academy），嗣後這個字竟成了一般學院的通稱。在那裏，柏氏與他的哲學伙伴們共聚一桌，窮研數學、辯證法（亦即哲學）及其他學問，這些科目似乎都跟訓練從政之士有關。這樣的一個機構並非出於柏氏首創，很可能是他模仿義大利畢達哥拉斯學派的類似團體而建立的。學院中學員很多，亞里斯多德不過是其中傑出的一員。這個學院繼續存在了好幾個世紀。

柏拉圖六十歲左右的時候，戴奧尼修斯一世駕崩，戴奧尼修斯二世繼位。他的母舅戴昂想到柏拉圖也許能够把少君塑造成「共和國」所說的哲王，以實現多年的理想。這原是一個甚難實現的計劃，柏拉圖應邀前往賽拉鳩斯時，當亦只是勉強爲之，心裏並不抱什麼希望。但是鑒於他在「共和國」所說的：這樣的一位哲王乃是解救人類的唯一希望，他

大概也很難拒絕這項挑戰。年輕的邦君，人很聰明，卻沒有耐心接受系統的授課；而無疑的一定還有許多旁的事物在吸引着他的注意。戴昂不久即告失寵，且遭放逐，柏拉圖亦隨即告辭返鄉，離開西西里，與戴昂重聚於雅典學院。不過戴奧尼修斯對柏氏仍然十分友善，且相約在時機比較成熟時再請柏氏與戴昂前往。

四年之後，戴奧尼修斯邀請柏拉圖重臨西西里，且應許戴昂在一年後回國。他自稱長久潛心哲學，熱忱不衰，又請知名哲人多人爲證。柏氏身受多方壓力，最後終於同意。但是戴奧尼修斯依然頑梗如昔；一面做出儼然哲王的模樣，一面卻堅拒戴昂返國，且沒收其財產而變賣之。柏拉圖失望之餘，設法克服困難，逃離西西里。其後戴昂企圖以武力恢復權位，柏氏拒不支持。戴昂的企圖初步獲得成功，但旋即遭到同伙的刺殺。刺客不是別人，竟是柏拉圖學院的一名學員——卡利柏斯（Callippus，他並不是對校友施行政治謀殺的唯一柏氏學生）。柏氏對政治的斷語，竟然一一不幸而言中，這時他早已置身圈外、一心以學術爲務了！

第二章 柏拉圖的前驅

要了解柏拉圖，我們還得留意一下可能對他有所影響的前輩思想家。我們是否管他們叫哲學家，並不重要，因為「哲學」這個名詞有廣義與狹義之別。他們的作品充其量也只剩下少數片斷，我們有關他們的知識幾乎都是來自後人的傳述；因此蘇格拉底以前的哲人們，一向都是學者們爭論的對象。然而從這些爭論並沒有產生多少可以信以為真的結論；在此我們只能撷拾若干業經歸諸這些哲人且「可能」成為柏氏知識背景的觀念，而略加檢視——「如果」這些觀念確曾流行於柏氏當時的希臘的話。從表面來判斷，出現於柏氏對話錄的觀念，似無可能全部出諸柏氏新創；事實上，確有不少證據可以證明它們不是如此。哲學中的原創性，通常不存在於具有新思想，而在於釐清未經釐清的思想。

希臘最早期的自然哲學家，當以西元前第六世紀愛琴海東岸米里塔斯(Miletus)地方的泰利士(Thales)為第一人。他們的興趣主要在於宇宙論。但鑒於希臘文 Kosmos 這個字(宇宙論 cosmology 這個詞便是源出於此)還含有一個道德的意義(秩序井然 good order)，我們有理由懷疑他們的動機僅限於科學的好奇。柏拉圖在〔斐都〕篇中就把下述見解歸諸自然哲學家安納克扎哥拉斯(Anaxagoras)，這種見解認為「心靈把秩序加諸萬物，且予以最適於存在的安排。」